



东北大学中国满学研究院

2018 · 2

滿學研究

東
北
大
學
中
國
滿
學
研
究
院

主編 何曉芳

民族出版社

2

主編 何曉芳

滿學研究 2

ᡩᠠᡳᠮᠤ ᡵᠠᡳᠨ ᡵᠠᡳᠨ ᡵᠠᡳᠨ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学研究. 2 / 何晓芳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105-15671-9

I. ①满… II. ①何… III. ①满族—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①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3827号

满学研究 2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贾俊杰 赵莹

封面设计: 刘福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64271909 (汉文编辑一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mzpub.com>

印刷: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字数: 220千字

印张: 10.25

定价: 35.00元

书号: ISBN 978-7-105-15671-9/K·2746 (汉1566)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满学研究》编委会

主任：赵杰

副主任：何晓芳 余梓东 赵阿平 赵志忠 朝克 施立学

主编：何晓芳



目 录

文化哲学

- 近代转型：“中华”和“满汉关系”的演化/周竞红 3
- 满族文化的时代价值与理性视阈下的共有“精神家园”
认知/高 梅 何晓芳 16

文化变迁

- 清代满蒙旗人驻防科举以及对广州驻防八旗文化影响考述/沈延林 25
- 从扈什哈理氏敕书看清代八旗子弟盛极而衰/张德玉 王桂红 43
- 论满族的民族融合历程研究/李学成 54

民间文学

- 婚姻叙事与社会权力关系建构主题下的满族说部/隋 丽 79
- 满族蒙古族民间故事文本化资源的活态多元化转换与传承/齐海英 89

语言文化

- 清代盛京地区满文使用的轨迹——以语言政策为视角/穆峯臣 刘 楠 101
- 满语名号概论/綦中明 110

试析兼表致使义与被动义的满语中缀-bu-及相关问题/张殿典 121

论满通古斯语和契丹语的共有名词
——以《钦定辽史国语解》为例/卡 佳 128

满族自治县

魅力伊通/刘红彬 刘崇抒 139

多彩丰宁/李亚平执笔 148

满族文化传承与资源开发

民间文学传承实践的新思路、新做法 159



文化哲学



近代转型：“中华”和 “满汉关系”的演化*

周竞红**

中华民族近代转型指清末以后，王朝国家演替的历史为种族—民族建国和种族—民族冲突替代的历史过程中，传统中国“华夷”观念为未成熟的种族—民族话语所替代，曾经构成王朝中国臣民的差异群体被解读和想象为种族—民族群体，基于王朝政治的中华整体认知也向族际化转化。“五族共和”的确立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矛盾拓展了有效路径，奠定了统一多民族中国新建构的社会基础。满洲—满人—满族在满汉对立中分化并历经“革命”洗礼成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平等成员，满汉关系重构奠定了统一多民族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条件。为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有日本学人 20 世纪初提出“清朝非中国”论，亦有人将辛亥革命解读为从清帝国独立建国的分离主义运动。事实上，在“华夷”杂处基础上建构的王朝中国“民族”一登陆便被不断改造，各历史群体和中华民族转型同步发生，最终形成今日“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借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建构而完成转型，满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一、清王朝时期的“中华”“满汉”

作为王朝中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历经 260 余年的统治，王朝社会政治统一性进一步发展。王朝政治运行中满洲人或满人、汉人等差异性族体间有一定的社会边界，但绝非严格清晰。满洲人或满人群体形成是王朝政权所依托部族与周边群体在王朝政治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初心与使命在红军长征中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8BMZ003）。

** 周竞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智库研究员。

约束下整合的结果，汉人亦是历史上“诸夏”中原群体在不同时代融合周边族体形成的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群体，满汉都是清王朝政治统治的臣民，在种族—民族话语进入王朝中国之前，满汉矛盾、竞争、合作、冲突、融合于王朝社会生活，“中华”一词魏晋时出现，为“中原”“中土”同义，清王朝时期在与“洋夷”竞争中已成为清王朝的对外自称。

从历史上看，以满语骑射为主的满洲认同并非现代民族认同，其认同中实未包含现代民族认同的主权、自主等方面的内容。直到民族国家话语传入之前，满汉等分类仍然为“五方之民”分类传统，以“大一统”王朝政治为中心，各群体间合作又冲突，支撑清王朝处置族类群体间关系的核心理念是“大一统”社会“非我族类”和“华夷之辨”，构成王朝政治最高认同并非民族认同，而是王朝政权的“正统”性及其封建秩序维护。王朝中国政治更迭的历史，以“五胡乱华”与“华夷”争夺演替，“诸夏”与“四夷”长期互动交融，差异群体在“华化”与“胡化”变迁中凝聚。

以农耕文明为基本保障的中央王朝发展了“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并以“诸夏”群体的整合为历史起点，在“夷狄”之裔“华化”，“诸夏”之裔“胡化”全面互动中，推动了“汉”文明，“汉”文明周边的“四夷”则在吸收“汉”文明成果的同时不断取得发展，并成为中央王朝政治的竞争者。“大一统”政治成为超越任何族际身份的政治力量。

清王朝运行过程中，满汉双方统治上层总体上为合作关系，汉臣是清王朝政治重要的支撑力量。最初清军能够入关并夺得政权，其中满汉关系成为关键之一，随后满、蒙、汉等服从“大一统”政治是清王朝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社会条件。清王朝皇帝入主中原，通过发展王朝政治和“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正统”理论，“奄有中原”并“……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的合法地位”^①。在清王朝政治权力运行中，“皇家”充分发挥满汉和蒙的不同特点，安排相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和扩大王朝中央政权影响力，“初制内外群僚，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逮文宗兼用汉人，勋业遂著。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于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于汉人。季世釐定官制，始未尝不欲混齐畛域，以固厥根本也”^②。清王朝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以及统治的巩固和便利而配置满汉员额，构成政治关系。雍正曾

^① 郭永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见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2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清史稿》志八十九。

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中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定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①而且，“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定，上下一体，君父臣子之分定于天，尊亲忠孝之情要于性。未闻臣子之于君父，合体同心，犹可丝毫形迹相歧视者也”^②。显然，清王朝以“正统”代表中国。

王朝政治“差序格局”中满汉关系不平等是社会本质。在王朝政治格局中，文化差异群体的角色定位多依据其对王权巩固的意义而确定。满汉在清王朝“大一统”政治中的政治地位、享有特权等方面的差异，是当时社会关系的本质，王朝政治不以追求这关系平等为目标。皇帝倡导“满汉一家”并不表明满汉关系建基于平等基础之上。因为，王朝政治中的“一家”之中权力格局仍然以差序为本质，以“长幼”“尊卑”“上下”为序，“天命观”等社会观念促使差序格局制度化得以维系。满汉在王朝政治框架下交往互动，满文化得以发展和提升，汉文化中亦注入大量满文化因子，有清一代举凡人们的衣食住行中充满了满汉文化交融的因素和特性。

对于王朝政治而言，军事实力支撑下的政治实力决定了王朝政权的稳固性。为巩固王朝统治，清朝执行了一套与中原士大夫合作的政策。笼络利用“顺治”的文人士大夫，削发令的执行和文字狱之兴，与其说是为了维护满族文化的持续，不如说主要是为了维护皇权的巩固。在王朝政治实践中，皇帝将满汉文化成果结合起来服务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代表满洲亲贵利益的权力阶层面对“大一统”且多样化的社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并发展了古代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维护的智慧和策略，合纵连横，分化统治，将王朝封建国家政治推向最高阶段。

如果将满洲群体起源与女真在北方的历史活动联系起来的话，满汉的关系并非始建于清朝，他们之间并非是完全陌生的异类，而是早已存在历史联系的群体，女真与中原农耕汉文化的历史关系是满洲群体成长的重要动力。满汉作为社会分类虽然显著存在，但并非焦点且不具民间性。对杭州城驻防旗人与城内居民关系演变的研究表明，“满汉之别在19世纪下半期尚未成为与旗人共居一城的人们关注的焦点”^③。辽东地区满人族谱研究则发现，汉军旗人为着生存利益在不同的时代选择不同的群体归属，有

①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巳卯。

② 《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巳卯。

③ 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15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清朝时入旗、民国时改汉现象。^①这说明，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并未形成普遍且不相融的民族意识。

如果说王朝中国的“五方之民”在“大一统”政治统治下形成了动态的合作、竞争、冲突等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关系不仅具有变动性、多样性的特点，且历史悠久，不同群体之间关系密切程度也大为不同，他们之间关系变化围绕着“大一统”王朝政治统治和区域社会生活自治的模式展开，这种关系常常在不同政治力量争夺“正统”的过程中产生变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刻历史联系。兴起于中原的“诸夏”之裔历经秦汉多次大迁移和大融合，形成王朝中国，被称为“汉”或“华夏”的族体，繁荣了农业文明和汉字书写系统，以儒、释、道等不同信仰为精神文化内容，但是在衣、食、住、行和社会风俗等方面不仅存在阶级阶层的差异，还存在着巨大的地域性差异。在清王朝他们多被称为“汉人”，也有被称为“民人”。与其共生共存的还有满、蒙古、苗等文化差异群体，在服从王朝政治统治方面他们同样秉承了“三纲五常”和“大一统”等理念，绝大多数人更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如何生存，而不是不同的文化身份问题。换言之，在王朝“大一统”政治统治面前，无论满汉均未真正发展出强烈而排他的民族理念，这也正是王朝中国不断演化的基本条件。

二、清王朝末期满汉关系的转型

清王朝末年的边疆危机在中西对峙中加深，清王朝统治的中国不得不面对历史上从未识见过的“西夷”。人们对“西夷”的认识最初仍使用传统的夷夏观，但是人们发现“西夷”与历史上的“四夷”有着显著的差别。那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们，看到“黑”“白”对立中黑人惨遭压迫，在王朝中国不断退败中体会“白”“黄”对立，并接受进化论和种族观念，定位当时是一个“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②的时代。因此，“戊戌”（1898年）前后，“保种”“种战”的呼声即已喧嚣尘上，席卷一世。兹后，种族之义浸濡日深，蔚为晚清时人认识自我、解释世界的主要框架。^③社会激进力量已开始追求“革命”，并进一步扩展种族—民族内向与外向所指，种族—民族新理念似乎在推动解构“大一统”王朝政治一体性力量的聚集。

^① 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1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胡希伟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22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③ 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见贺照田主编：《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27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早在1895年严复就提出“亡国灭种”的警告。^①同年，康有为警示世人“吾神明之种族”必须及早为计，免蹈覆辙；^②1897年皮锡瑞指出：“保种必先开智，开智方能自强。……我黄种之人，聪明才力，不在白种之下……”^③；梁启超、唐才常等则强调“黄”种优于黑、红，可与“白”种竞争。1898年，维新派成立保国会时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明确目标。直到维新之前，维新派所倡导的不过是黄色种族主义。^④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在文化、类型、宗族、民族、种类或种子等许多层面上应用过“种族”，具有特定政治竞争含义的“种族”学说则出现于19世纪末。^⑤陈寅恪先生对南北朝胡汉之别的研究结论认为在文化不在种族，^⑥余英时也曾指出过传统中国区别“中国”与“非中国”重在文化而非血统种族，南北朝时期史书上所见“中国人”“华人”“夏人”“汉人”的含义更多是指文化上有差异的人。人们的种族意象受到自身所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况的影响，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不同群体的划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某某人”范畴，这一范畴更多地依据文化差异而非种属之别。种族观念日益扩展与留日学生中激烈“排满”情绪的形成相表里，“人们根据一种严格的种族分类学被划分开来；历史成为各竞争种族的战争；政治是斗争的民族竞技场”^⑦。清末新知识分子或精英已运用西方的“种族”概念并结合王朝中国传统的“华夷”之分重置“满汉”关系并累及北方各族群。孙隆基先生指出：“从解构学角度看，一个名词没有先天的含义，它之指称对象视其处于‘差异性系统’（system of difference）之内位置而定。‘种族’一词如用来界定满汉之别，就会引申出光复汉族的结论。”^⑧换言之，在王朝政治危机中，最深层的危机在于满汉关系重构。使用“种族”——民族主义理念重置满汉关系，人们由此只关注满汉矛盾与冲突，在深入挖掘这种矛盾和冲突过程中，不仅涉及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常常溯及遥远的历史深处。“历史上异族入主中国是亡天下而非亡国，种族矛盾纵使有，亦必透过其他符号表达……至清末，满人已经被同化，清代其实是历代最崇儒的王朝，因此，清末满汉

① 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晚清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②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见《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精选》（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

③ 湘报类纂乙集，卷下第13页，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④ [美]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纬线》，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⑤ [英] 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⑥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6~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⑦ [英] 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⑧ [美]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纬线》，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种族矛盾’之冒现乃是基于政治考虑的新生事物。”^① 革命者甚至直接将“满人”“汉人”差别对应为“满种”“汉种”，满汉畛域不断被发明、发现和放大，“种界”和“民族”话语成为瓦解“大一统”政治中“满汉”一家或满汉共效皇帝或皇权政治的理论依据。部分革命者迷失或困惑于“中国”“中国人”“华夏”民族等概念中，他们用“中国”“中国人”和“华夏”概念否定满、蒙等族体在国家中的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彰显“汉种”地位，推动“种族”和“民族”之别直接对接“华夷”差别。在革命环境目标激励下，为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达到革命目的，他们称“吾宁使汉种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享升平、舞河山，优游弋鞑鞞之下……”^②。更有人称“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满汉不能两立”^③。由此，革命者通过演讲、书刊发行，发布大量妖魔化“满人”的信息。革命者认为“清虏执政于兹三百年矣，以愚弄汉人为治世第一义，吸汉人之膏血，锢汉人之手足，为满奴升迁调补之符。认贼作父既久，举世皆忘其本来，经满政府多方面之摧残笼络，至民间无一毫反动力，以酿成今日之衰败。……方今世界文明日益增进，国皆自主，人尽独立，独我汉种每况愈下，濒于死亡。于斯时也，苟非凉血部之动物，安忍坐圈此三等奴隶以与终古”^④。现在存世的革命党人文献中，《灭汉种策》最为奇特。它是一本对满人攻击最厉害、最系统的宣传品，作者似为留学生集体，他们以满人的口吻，以最恶毒的语言，发布灭亡汉种的策略，包括灭汉种农商、会党、学生、士、官吏、兵、妇女、僧道。^⑤ 相应的宣传影响多集中于江浙、湖广一带，或中心城市地区，影响所及主要在于社会精英和社会上层。社会精英和革命者的策略多为以种族、民族观重新审视王朝中国多元的文化群体，首先将占据统治地位的满人置于对立面，置汉满于完全敌对以佐证革命的正当性。“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汇通于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节节内卷的社会矛盾得以附着聚合，在知识人的论说里激烈地归向排满一途。”^⑥

“排满情绪的高涨并非源于本地社会中民族矛盾激化，而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

① [美]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纬线》，17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7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③ 张继：《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见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集），94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④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172~17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⑤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对日本档案中两份重要反满文献之考察》，载《中国近代史》，2007（5）。一说为宋教仁所撰，参见董守义：《清代留学生运动史》，288 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⑥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32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产生的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①，汉人意识汉民族主义化并确立其目标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汉民族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也逐步推动了满、蒙民族主义的生成，除了王朝统治衰弱，还有俄、日等的利诱，具有一定现代特性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分解文化多样性中国的重要工具。汉民族主义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话语。^②清末以后，所谓国家民族建构从政治实践来看实际上是主权国家的建构，主权之争最初是由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政权为主角。在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中，清朝的皇帝性质正在由历史上的“天下共主”向主权国家代表的地位转型，只不过这一转型最终因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是主权国家政治结构转型的初步成果，正是由于这一转型成果，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于中国。

王朝时期的中国不是依据认同来整合社会和不靠条约清晰边界的国家单元，清末之前“民族”不是解释王朝中国历史政治发展脉络的真正有效概念。如以血缘、语言、服饰、习俗等来区别不同群体的族性，判断社会中各群体的同一性或同质性程度的话，不仅满汉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就是满汉群体内部在这些方面也并非高度一致或同质化，上下五千年的王朝政治统治促成大量差异性群体间在社会生活中直接交往并在差异中共存共生，满汉群体所指的相对性显而易见。清末，在很多地方满汉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转化为阶级差异而不是“民族”差异。

清朝末年，在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过程中传入的种族—民族观念被用于分析“黄白”对立的同时逐步将满汉对立种族民族化。汉民族主义在革命者中从国家主义中分离，首先推动汉人知识分子民族化，满人在这一进程中作为汉民族主义的敌对力量被民族化。相对于汉人民族化，满人的民族化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其程度既不深也不广。皇族政治和其背负“大一统”的社会目标等，使满人的民族化缺少主动性，并随着王朝政治的危机和解体而受限被潜在化。民族建国论吸引着民族主义者的注意力，成为革命派“排满”革命的重要理论支撑。

清末，种族—民族观念倡行除了影响到革命者和具有新思想的社会精英外，也随着变法改革的呼声上达“天廷”，并由此促使“朝廷”在“救亡”的主题下将满汉差异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纳入国家政治转型的背景。为维护王朝政治持续，人们提出统编旗籍民籍、不分满汉选贤任能、放松旗民管制和促使旗民自谋生业等。满汉在朝的权

^① 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15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利地位受到人们的关注，依贤德任事和不必求满汉并列等要求的提出似乎表明，传统“夷夏”观处理的满汉正在被种族—民族观所解读。换言之，具有新价值的观念正在变革王朝中国社会，变革着满汉关系的定位和解读。革命组织同盟会宣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汉族知识分子或“文人”开始全新解读汉族历史，推出一系列汉民族英雄，将王朝中国“大一统”历史中“五方之民”的臣民关系逐步改写成民族之间竞争、侵略、殖民的关系。

清王朝政治危机背景下的满汉关系转型，不在于满汉差异为人们所关注或感知，不在于日常的矛盾与竞争中的冲突，而在于“汉人”向“皇汉”民族、“中国民族”、“汉族”的语义学转化过程中，推动“满人”向“满族”的转型，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悄然变迁。“民族”在人们看来显然不是新的人类群体划分，只不过使原初社会族类群体划分和关系处置增加了新的原则、价值观或理念。在清王朝政权危机的背景下，“民族”在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概念和分类方式，满汉分野则是这一分类方式第一次应用，在“救亡”“保种”的话语氛围中，“民族”逐步成为重新定义王朝政治架构下不同臣民群体之间关系、个人与国家政权关系，以及社会政治运动的模式。在“民族”话语中，皇家与国家分离，天下与国家分离，“民族”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则追求边界清晰、具有特定领土空间。在历史的危急关头，“民族”面对中国社会实际，开始其被改造的历史进程。“民族”与王朝中国的“五方之民”“夷夏之辨”等历史资源相互融合、竞争、互渗，于是，我们今天中文语境中的“民族”不仅有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而且有族裔层面的有着不同历史传统或过程的 56 个民族。当然，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就算是在辛亥革命最激烈之时，汉民族认同亦未全面取代社会上的其他认同。当民族“这个现成的惯用的概念被用于新环境之中，与新环境的某些方面相对应。而这新情境的许多方面是这个惯用概念原先所处情境中没有的。人们在认知中把这个词与新情境结合起来，使这个词具有了双重含义。原先的含义渐渐模糊，而人们对新的含义则习以为常。当这个词又在新的情境下被使用时，这一过程又再次出现”^①。伴随着中国国家转型特定历史时期传入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极为复杂的特性，国家民族主义最先为政治精英们所认同并传播，在革命者及其所动员的社会精英那里，基于对王朝政治腐朽无能的不满，他们转而强调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群体凝聚成汉族的人民特殊性及其主权性。与此同时，革命者所强调的民族主义内含着反对封建特权的目标，民族与民主一致性得以保持。正是汉民族主义直接推动了王朝中国社会结构

^①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4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和政治结构的转型，“人民主权观念——作为民族观念的要素——输入，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变”^①。

三、中华民族转型中的满汉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王朝国家循环发展的历史，主权多民族国家如何建构受到极其复杂因素的影响，并非革命者、保皇者或昔日统治者可以随意规划和设置。清末民初国家政治利益格局复杂，王朝中国政体转型为时代所决定，“当西方核心社会（它们将自己界定为民族）的影响范围扩大时，属于或寻求进入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超社会体系的社会实际上除了成为民族之外别无选择”^②。结束王朝统治的中国必然要走国家转型之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却并非为由革命力量自行决定之事，历史在这一关键时刻显示了其特有的影响力。

武昌首义，军政府建立，其所发布信息都是关于恢复汉土、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者。革命者以皇汉民族即为中国主人相号召，满族被视为侵略者和占领者。鄂军都督致书清政府，宣称革命的合法性和光复汉族和建立民国的目标，充满了种族—民族主义的特色，同时又掺杂着大量传统非我族类的思想观念，汉族由此成为一个胜利的复仇者，清王朝则被视为满人的政府。其发布的致清王朝阵营中将士电则以“我辈皆中国人”相号召，试图通过讲汉族受压迫的历史和清政府对汉人的压制等，动摇和分离清王朝力量，并称“方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磅礴人心，举国之人，皆知明理仗义，固非若昔日人心否塞之时；军政府提携义师，肃将天讨，其与四百兆人平等以尽国民之责，亦与昔日之英雄割据有别”^③。8月24日发布的告全国文，历数清王朝侵越土地、文明的罪恶史，以求“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④，这里的全国并非指清王朝全境，仅指“十八行省”。8月27日军政府要求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严守中立的布告言语则有些含混，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事……”^⑤ 濒于灭亡的清王朝并未如革命党所安排和

①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1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②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1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③ 熊守晖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上），472页，台北，中华书局，1971。

④ 熊守晖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上），476页，台北，中华书局，1971。

⑤ 熊守晖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上），479页，台北，中华书局，1971。